

家庭视角下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探索*

孙卓元 黄勇 王薛

提 要 为探讨中国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采用文献和调查相结合的比较分析方法,发现:我国乡村生产生活的演化历程表明,“家庭”是我国乡村生活圈建构的逻辑基点,具有鲜明的本土性。考虑家庭这一要素,过去生活圈“行为—时空—优化”共性建构逻辑在应用于我国乡村生活圈实践时,有家庭代际行为视角、城乡一体时空界定、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三个方面的适应性需要注意。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在于:在村民个人的行为规律研究基础上,考虑家庭整体的行为规律研究,以建构我国乡村生活圈独有的空间模式并对其服务要素进行配置。提出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的“家庭行为—空间模式”学理逻辑,进一步形成建立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就近就地背景下的空间体系、乡内互助向城乡互助转化的本土化理论方法。

关键词 城乡规划;乡村生活圈;家庭;本土化理论;城乡融合

A Localize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Rural Life Circle Construction from a Family Perspective

SUN Zhuoyuan, HUANG Yong, WANG Xue

Abstract: To explore a localized theory for constructing rural life circles in China, this study utiliz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survey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behaviors reveals the centrality of "fami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fe circles, which bear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en considering the family as a core element, and applying the past life circle construction logic of "behavior—space-time—optimization" to the Chinese rural life circle, three aspects of adaptability can be discern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behavior perspective within families, the temporal-spatial defini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s. In summary,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theory of rural life can start from individual villagers' behaviors and extend to family behavior as a whole. The new construct represents a unique spatial model of Chinese rural life circle which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a "family behavior-space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hinese rural life circle construction, which includes research methods for establishing social proximity space-time path, a rural life circle spatial model based on proximity, and the mechanism of transforming intra-village mutual assistance to urban-rural mutual aid networks.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rural life circle; family; localized theor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406005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4)06-0027-10

作者简介

孙卓元,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915131097@cqu.edu.cn

黄勇,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通信作者,hyong@cqu.edu.cn;

王薛,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乡村流动人口规模为2.72亿人,其中,省外流动人口8200万人,省内流动人口1.9亿人。村民的生产生活行为已不再局限于乡村内部^[1],构建适应村民城乡流动的生活圈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的基本保障之一。

乡村生活圈理念源自1969年日本《农村生活环境整備计划》,提出要研究“人们生产、生活等诸多活动在地理平面上的分布”,建构“村落—大字—旧村—市—市町村—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村镇空间扩展的时空模拟关键技术”(项目编号2018YFD1100804);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重庆市生命线网络级联故障表达、模拟与空间干预”(项目编号:CSTB2023NSCQ-MSX1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2024CDJXY014)

地方都市圈”的乡村生活圈体系^[2]。1987年，陈青慧等^[3]将生活圈概念引入我国。2021年，自然资源部《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等国家或地方各种技术标准相继出台，推动我国生活圈建设规划实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4]。

诚然，结合中国国情的乡村生活圈建构本土化理论也应同步推进，达到改善村民生产生活，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本土化理论是结合当前研究，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华而形成的相关理论。在城乡规划领域，邹德慈^[5]院士认为应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实际，目前本土的城乡规划学术理论体系仍在发展^[6]，由人居环境科学引领，相关研究从单纯物质空间逐步升级到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角度来解释中国城乡空间的内在发展规律^[7]，相继产生了“空间基因”“流乡村”等本土化理论^[8-10]。生活圈建构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也为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提供了丰富储备。现有研究^[11]表明，国内外生活圈建构普遍存在“行为—时空—优化”共性逻辑。乡村生活圈秉持该思路，利用村民个体行为规律与乡村物质环境的结合，将乡村生活圈建构理论理解为在“行为—时空—优化”等共性研究逻辑基础之上，通过对个人行为及其地理分布的刻画来构建生产生活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规划原则。然而，对我国乡村社会生产生活行为演变历程的梳理显示，“家庭”一直是影响村民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理解为村民个体行为仅是家庭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之一。在我国乡村社会发展情景下，与国外或城市地区的个人行为不一样，国内村民个体行为难以建构自身独立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这也导致我国的乡村生活圈实践与当前的共性逻辑存在三个适应性问题，一是家庭代际行为视角的适应性问题，二是城乡一体时空界定的适应性问题，三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适应性问题。

为此，试图挖掘家庭这一要素，提出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其“本土化”在于：在过去村民个体的行为规律研究基础上，考虑家庭整体的行为规律研究，以建构我国乡村生活圈独有

空间模式并对其服务要素进行配置，在此形成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的“家庭行为—空间模式”学理逻辑，建立起符合中国乡村现实场景的生活圈发展路径，为乡村生活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1 乡村生活圈建构的共性逻辑

当前研究表明，国内外乡村生活圈有着“行为—时空—优化”建构的共性逻辑（表1），三者的侧重点不一样。行为逻辑主要是以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总结社会变迁下国内外村民个体行为的类型化特征；时空逻辑以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等学科为基础，强调日常行为个体与服务要素在地理时空上的高度配合；优化逻辑以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公共管理学为主导，提出服务要素配置思路。

乡村生活圈建构的行为逻辑旨在解释村民行为及其模式。相关研究可追溯到乡村生活圈理念提出之前，有四种分析范式^[12]。其中：生存理性来源于斯科特（Scott）^[13]的道义小农；国内则解释为血缘宗族影响下的传统小农^[14-15]。经济理性范式将村民行为限定在舒尔茨（Schultz）、波普金（Popkin）的“经济理性”中^[16-17]；国内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一系列本土化的行为研究，其中以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收入工作、倾向于长期经济投资活动为特征的货币理性为典

型。“制度—行为”范式以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为起源，梳理村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行为变迁。目前，国内“社会化小农”认识是学界研究^[18-20]的重点。“关系—行为”范式以齐美尔（Simmel）^[21]形式社会学为开端，逐步解构为以布朗（Brown）^[22]社会网络、拉图尔（Latour）^[23]行动者网络为指导的社会关系研究；国内侧重于梁漱溟^[24]关系本位，费孝通^[25]差序格局、许烺光^[26]情境模式等经验主义，旨在探究乡村地缘关系主导的社会交往行为^[27]，或分析乡村血缘关系主导的家庭生产生活行为^[28-29]。

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时空逻辑是将行为学研究成果映射在地理空间上，探讨行为对空间的使用，强调行为与物质环境的关联^[30]，以此产生了时空行为起止点（origin-destination, OD）、时空行为轨迹（trajectory）等研究。前者对可达性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空间进行分析^[29]，是国内认识村民行为空间的主要方法；后者考虑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突出行为反映空间的认知过程和偏好选择^[31-33]，日本学界对其涉及较多。国内外学者也对行为所反映的空间进行理论化总结。上述三种方式最终形成了乡村生活圈可达性时空分布、行为化时空分布、概念化时空分布等三种解释（图1）。在可达性时空分布研究方面，国内产生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空间体系，这日益成为该研究方向的核心内容^[34-37]；部分西方学者^[38-39]也利用这种可达性思维，将

表1 建构乡村生活圈的行为逻辑、时空逻辑和优化逻辑

Tab.1 The behavioral logic, space-time logic, and optimization logic of constructing rural life circles

类型	中心主题	研究内容	相关学科	目的
行为逻辑	行为规律	①生存理性范式：个人生存状态约束下的村民行为 ②经济理性范式：村民任何行为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 ③“制度—行为”范式：国家政策和制度对村民行为的塑造 ④“关系—行为”范式：从社会系统和社会关系出发，探讨村民行为及其去向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化学	理解村民行为，为乡村生活圈空间布局提供参考，是乡村生活圈建构的基础
时空逻辑	空间反映	①可达性时空分布：村民一定时间内通达范围进行可达性分析 ②行为化时空分布：村民时空轨迹的空间界定 ③概念化时空分布：村民行为形成地理空间的理论化总结	城乡规划学、地理学	总结乡村生活圈应有的空间模式，是乡村生活圈建构的关键
优化逻辑	优化策略	①供给角度：服务要素的社会公平 ②需求视角：服务要素的差异化需求	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公共管理学	完善乡村生活圈内的服务要素配置，是乡村生活圈建构的保障

“X分钟城市”应用于乡村中。行为化时空分布则是一些日本学者依靠村民活动日志,不仅探讨近郊地区乡城通勤、居业融合的乡村生活圈^[40],而且思考随人员世代变化及私家车普及,乡村生活圈空间广域化的一般性规律^[41-45];国内在此方面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46]。概念化时空分布旨在建立一种满足村民全生命周期的空间类型,以东亚国家为代表,日本相继建立了地域行为差异^[47]、学龄孩童教育^[48]、通勤交通导向^[49]、面向不同年龄阶层^[50-51]的乡村生活圈;国内则结合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引导,形成基本—高级生活的乡村生活圈圈层构造^[52-53]。

乡村生活圈建构的优化逻辑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村民生产生活行为形成的空间进行优化指导。社会公平是供给视角相关研究的主要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考虑的是建立高效的城乡交通体系,必要时可扩大乡村生活圈的生产生活范围^[54-56];国内则针对可达性圈层,考虑千人指标、服务半径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计划^[57-59]。需求视角则重在服务要素的人为偏好研究,以日本为主导。重在考虑乡村高龄者的设施地区共享、市町村相互交融的公共服务发展^[60-62],此外也聚焦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三大都市圈近郊年轻人员的城乡往来问题,形成快速通勤换乘、便于生产生活、疏散大都市人口的近郊生活圈空间发展路径^[63]。

2 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的“家庭”要素

总的来看,国内外乡村生活圈研究,基本思路是在理解村民个体行为基础上建构满足时空需求的地理分布,以提升乡村社会稳定。但事实表明,家庭要素在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缘由不仅在于中国村民的个人行为始终牵涉着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仅从偏重个人视角的“行为—时空—优化”共性逻辑来建构乡村生活圈,并不能适应当前乡村实际。

2.1 家庭在我国乡村生活圈演化中的本

底作用

传统农耕社会的村民活动范围较小,与乡村聚落深度嵌套。受限于农业生产效率,村民行为模式被内化为一种“生存伦理”。就个人而言,表现为以“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小家庭生计方式为起点,扩展到事父母、申孝悌等文化习俗传统为依据的大家庭“同居共财共灶”,进一步推己及人扩展为家庭间相互联合、守望相助的乡村聚落。就社会制度而言,“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层层嵌套的乡里制度,展现了国之“大家”向村民“小家”传导过程中,对个人生存周密的制度保障。因而,将传统农耕社会的村民行为映射到地理空间而形成的生活圈,呈现出以家庭为单位,在农业谋生基础上“世代定居的常态”或“迁移变态”的规避,恰是费孝通所言的“乡土中国”。

现代社会的乡村生活圈逐步异化,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生存伦理,逐渐增加了小家庭“代际再生产”取向,但异化的起点和终极关怀依然是家庭行为。《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60.08%农村人口选择在城市务工^[64],

导致乡村家庭与土地生产资料逐渐剥离,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被打破,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都需要通过现金购买商品与服务这种方式才能得以生存,传统的生存伦理不得不叠加上货币伦理。这导致以大家庭为单位的行为不得不收缩为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代际再生产,并具体表现出3种方式(表2)^[65]。从生存逻辑来讲,家庭有托举直系血亲接力入城最终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朴素追求;从货币逻辑而言,大家庭举家由乡入城,从经济角度考量则难以操作。诸如流动人口的城镇住房拥有率持续上升、居留意愿受制于“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等现象^①,均是这两个逻辑叠加博弈的表现。这导致乡村家庭“离散化”,但家庭代际互动又使其“离而不散”。投射到地理空间中,乡村生活圈除了地理空间范围扩大,还有着更为复杂的行为空间表征。

2.2 乡村生活圈共性逻辑的适应性分析

从“男耕女织”到“代际再生产”,“家庭”始终是影响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的关键要素。因此在乡村生活圈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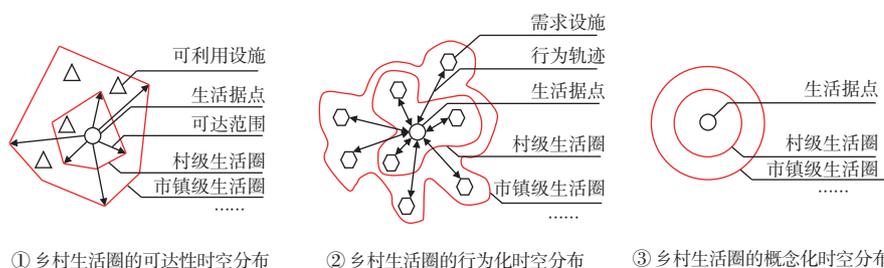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生活圈形成的时空逻辑三大解释

Fig.1 Three major explanations for the space-time logic of rural life circles

表2 中国乡村家庭的代际行为方式总结

Tab.2 Summary of intergenerational behaviors in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类型	特征
“半工半耕型”家庭代际行为	在村子辈家庭以多种方式,在城乡地区积累资本。父辈主要在乡村经营土地,并在村照看孙辈,有时又会外出打工,为子辈家庭进行一定的资金和物资支持
“撑开型”家庭代际行为	子辈家庭完全扎根于城镇、父辈家庭则定居于乡村。然而,现代交通发展使父辈、子辈家庭都可以较为容易地在城乡之间往返,即父辈家庭可以到子辈家庭探望并照顾孙辈,子辈家庭也可以在闲暇时间回村探望
“一家三制”型家庭代际行为	尽管当前家庭资本积累薄弱,但为后代接受质量更好的城镇教育,家庭成员多地务工务农。其中,子辈一员主要考虑孙辈抚养教育,并在当地从事灵活性就业补贴家用,另一员则以增加家庭收入为主要目的,在异地务工务农。父辈家庭一员可能会与子辈合力抚养孙辈,另一员则多留守乡村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65]修改总结而成

中，若简单套用以个人行为为逻辑基点的“行为—时空—优化”共性逻辑，将产生家庭代际行为视角、城乡一体时空界定、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三大适应性问题。见表3。

2.2.1 基于家庭代际行为的行为逻辑适应性

“家庭视角能够还原农民家庭的主体行动逻辑，有助于理解什么样的资源和环境对于农民家庭更有意义”^②。不关注新时代家庭行为“代际再生产”，仅依靠个人行为规律的探析，可能会导致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意与结果背道而驰。

以S省“合村并居”为例，本意是通过“拆迁撤并”方式应对去农化问题，构建乡村生活圈，改善乡村家庭生活生产生活环境，但一些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村民固守临时安置区、拒不上楼、频繁上访的现象（图2）。S省R市的问卷调查^③表明，50%以上居民不赞同合村并居，即便赞同的村民也有22.65%不愿意上楼，同时，愿意退还已经拿到手的拆迁补偿并要求获得1处城镇商品房的占比高达66.10%。原因就在货币逻辑上推高了村民生产生活的经济成本，在生存逻辑上除了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外再也没有获得其他回报，尤其是家庭成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这一核心诉求。反观Y省，一些同样执行“拆迁撤并”的市县政府则充分认识到家庭“代际再生产”行为的特殊性，适时采取就地安置、货币安置、异地搬迁安置等多样化方式，不仅顺利完成合村并居任务，还为家庭增收创收创造了渠道^④。这也说明，家庭“代际再生产”行为需要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功能的形态来支撑，乡村生活圈要合理嵌套家庭“代际再生产”行为，已经不能就乡村论乡村^⑤。

2.2.2 基于城乡一体时空界定的时空逻辑适应性

在乡村家庭的城乡空间分化以及家庭代际行为的整合过程中，乡村生活圈已不是简单地以乡村聚落为中心而延展出的空间类型，不仅表现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布局，而且还呈现出“城乡时空互动”的新要求。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⑥，在外地进城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已达22.6 m²，比上年增加0.9 m²。

表3 本土乡村生活圈建构的适应性分析

Tab.3 Analysis o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ural life circles

类型	现实情景	学术研究	适应性问题
行为逻辑	家庭行为的代际再生产	个人日常生活行为的关注	家庭代际行为视角的适应性问题
时空逻辑	家庭适应城乡生产生活节奏后呈现的城乡时空互动	以乡村聚落为基础，逐步延展的城乡时空体系	城乡一体时空界定的适应性问题
优化逻辑	公共服务供需的城乡差异化需要	考虑村民从基本到高级的生活需求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适应性问题



图2 家庭代际行为失衡的空间表现——以R市D区N镇某村的社区安置为例

Fig.2 The spatial manifestation with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imbalance: the resettlement of a community in R city as a case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拥有率从2010年的5.94%升至2017年的20.21%。在地方性调查中，王向阳^⑧在宁夏乡村调研发现，调查村的385户农户中，至少有200户（约52%）进城买房。王呈祥等^⑨在江苏调查得出，近50%农户在县城购买商品住房。笔者在S省R市D区的B村调研也表明，在城镇租赁住房、购买商品房的占比高达49.43%，其中子辈家庭占比高达90.12%，在村定居的子辈家庭仅有27.27%^⑩，且在村定居家庭的平均年龄达56岁（图3、图4）。苏红键^⑪进一步发现我国下辖的34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中，有30个省级行政区超过半数的在城村民选择在本县（市、区）租房或购房，乡村家庭以代际行为这一方式正在缝合一个相互联系、空间互动的“城乡联系网络”。

相关学者同样印证了此类事实，比如白美妃^⑫在山东省东部地区，肖琳^⑬在河南、江西、甘肃省等地都发现，尽管各代家庭离散，但通过代际行为，建构出生计、育儿、养老等诸多层面的紧密

互助合作。笔者以表2为参考，通过B村家庭代际行为归纳，进一步窥见这种“城乡联系网络”的端倪（图5）。在“半工半耕型”家庭代际行为中，仅有15户父辈家庭遵循该方式；在“撑开型”家庭代际行为中，将其分为子辈家庭是否有商品房两种形式。针对租赁住房这一形式的“撑开型”家庭代际行为，共有52户父辈家庭与子辈家庭开展互动，而针对商品房这一形式的“撑开型”家庭代际行为，则已高达72户；在“一家三制型”家庭代际行为中，有13户父辈家庭采取这种方式，并产生了特殊的行为前置和后置模式。同时，凭借着该地便利的城乡交通和较近的城乡距离，租赁住房 and 拥有商品房的子辈，在与父辈的互动频率上，一天和一周一互动频率占比达53.64%，塑造出“父辈在村、子辈在城、频繁互动”的双栖格局。从上述现象得知，城乡时空互动已对传统乡村聚落血缘—地缘—业缘高度契合的空间形态形成突破，家庭代际行为造成了乡村社会关系在城乡时空的重构和延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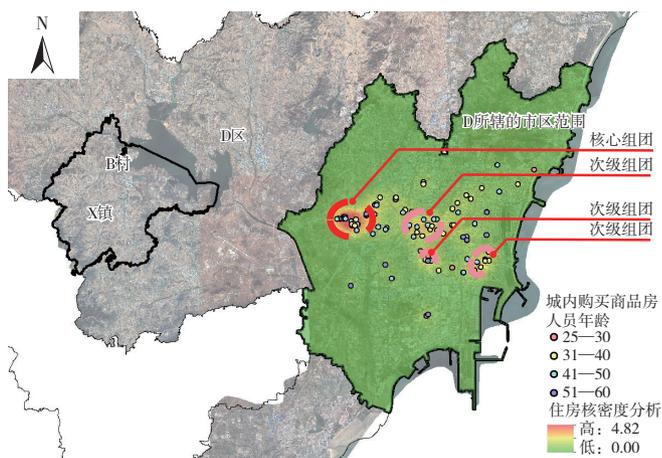


图3 B村村民在所辖市区购买商品房的概况

Fig.3 Profile of residents in a village purchasing commercial housing in the urban area in their jurisdi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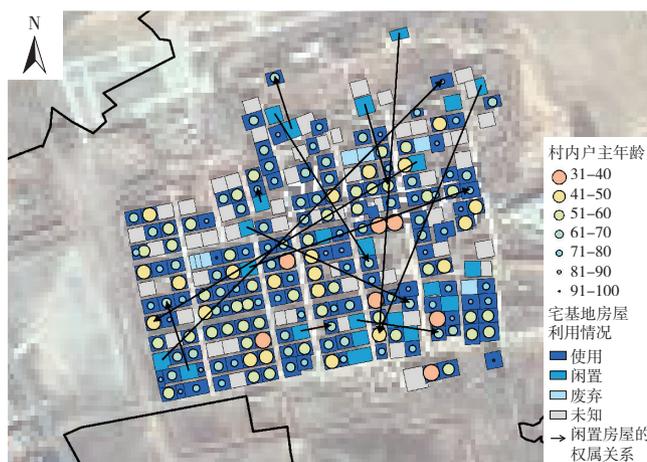


图4 B村村内住户的基本概况

Fig.4 Basic overview of residents in a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问卷调查和R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D区分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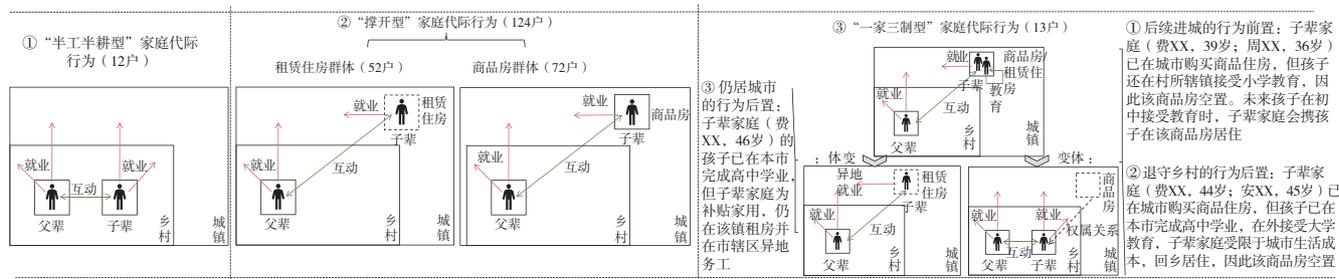


图5 B村家庭代际行为的归纳

Fig.5 Summary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behaviors in a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问卷调查

2.2.3 基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优化逻辑适应性

传统农耕社会塑造的乡村生活圈，是由“人、地、业、村”构成的稳定有机系统，而家庭代际行为引发了该系统的失衡，这为从家庭这一视角理解乡村生活圈的优化逻辑提出了新方向，具体表现为乡村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应构建适应不同代际需求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配置体系。

家庭代际行为对传统“人、地、业、村”乡村系统的冲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基础教育逐步萎缩。笔者在S省R市D区调研发现，该区90%以上的适龄儿童在城区上学，调研的8个乡村，绝大多数乡村幼儿园、小学已然停办(图6)，仅有A村，其小学还在继续招生。二是乡村老龄化现象突出。经调研发现S省R市D区B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50.56%，其他调研的4个近郊村(T村、C村、S村、Y村)基本维持30%到

40%区间，3个远郊村(J村、N村、L村)已达70%以上，乡村老龄化反映出医疗和养老设施成为当前乡村公共服务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需求。三是乡村老龄化带来了用地的闲置化和产业的空心化。用地的闲置化加剧了耕地荒废和宅基地房屋废弃(图7、图8)，其中B村空置和废弃房屋30处，占比达14.49%；产业的空心化则间接导致家庭父辈多希望守住宅基地和利用承包地获得收益来养老，耕地仅是满足口粮的手段，而不是增收创收的方式，以小麦种植为例，“国家补贴大约为130元/亩，但每亩需要的一般化肥要180元到200元/袋，优质化肥甚至高达300元以上/袋”^⑤。仅从事农业生产的B村村民占比为20.44%，平均年龄高达64岁，反观从事半工半耕和完全务工的村民，平均年龄则为54岁。与其交谈表示，“若不是年龄大了，大多数企业不会雇佣，他们会考虑继续务工”^⑥。

这些现实变迁使得乡村医疗和养老设施成为当前乡村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也使得城市基础教育设施有必要考虑乡村的诉求，展现出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愈发明显^[74]。乡村生活圈建设必然需要从城乡一体化角度统筹安排，解决乡村“人、地、业”一系列问题，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3 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的“家庭行为—空间模式”学理逻辑

通过前文分析，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是将过去村民个体行为规律基础下的乡村生活圈建构，转变为以村民个体行为为基础，考虑家庭整体的行为规律研究，以建构我国乡村生活圈独有空间模式并对其服务要素进行配置。总的来看，该理论体现出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的“家庭行为—空间模式”学理逻辑，即乡村村民的经济社会行为始



图6 多处停办的幼儿园及小学
Fig.6 Closed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图7 多处荒废的耕地
Fig.7 Patches of abandoned farmland



图8 废弃的宅基地房屋
Fig.8 Abandoned homestead houses



终在家庭语境之中，其反映的生活圈地理空间分布规律也应有所体现。如何体现其中的家庭语境，就有必要在乡村生活圈建构理论中的“行为—时空—优化”共性研究逻辑基础之上，增添家庭要素的本土化解释，从而形成建立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就近就地背景下的空间体系、乡内互助向城乡互助转化为主导的乡村生活圈建构本土化理论方法。

首先在建立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中，归纳中国乡村家庭时空行为机制，为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提供空间表征；其次在就近就地背景下的空间体系中，探讨中国乡村家庭行为反映的地理空间分布与生活圈的相互关系，为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提供应有的空间载体；最后在乡内互助向城乡互助转化中，则根据中国乡村生活圈的空间特征，形成因地制宜的优化手段，为乡村生活圈本土化建构提供服务要素配置渠道。

3.1 建立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

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social closeness space-time path）可追溯到20世纪初齐美尔^[21]的相关理论，基本内涵是时空行为轨迹与社会关系的紧密配合^[74]。我国乡村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与乡村家庭代际行为相互配合，造就了我国乡村家庭独有的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在时空逻辑上映射的行为空间有三个基本类型。见表4。

鉴于行为空间中家庭成员各异的行

为准则，优化逻辑重在根据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差异，形成面向不同行为聚类主体的服务要素配置优化思路（图9）。从前文可知，中国乡村家庭的代际再生产，其家庭成员都离不开就业、教育、居住等三大主线，使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的划分呈现就业、接受教育的“通勤层”和城乡定居的“居住层”。若在某行为聚类中，村民于“通勤—居住层”一直位于乡村社交紧密空间，表明其行为在本村的恒定状态，其行为优化要考虑本村务工务农行为的家庭生计影响，重在完善本村与产业相关的服务要素配置，同时这类村民也面临着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的可能，对其荒废耕地立足合

作社等服务要素，采取流转、托管等多样化方式，可为其提升土地资本而增添一份社会保障，并着重考虑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建设老年食堂、互助养老机构等新型养老设施。村民若在“通勤—居住层”处于乡城社交非活跃空间和乡城代际紧密空间的摇摆状态，表明其就业在城并已在城市购买商品住房，针对这类群体的行为干预，应充分考虑家庭成员的居业协同，减少家庭成员异地就业却考虑子女教育在本地购房的现象，避免小家庭内部亲情缺失。

3.2 就近就地背景下的空间体系

就近就地背景下的空间体系旨在结

表4 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映射的三大行为空间

Tab.4 Three behavioral spaces reflected by the social proximity space-time path

类型	空间界定	空间特性	空间内涵	当今情况
乡村社交紧密空间	本行政村，本自然村	地缘关系在乡村住所的实际反映	乡村家庭间的地缘交往，在乡村形成乡村社交紧密空间	家庭成员在就业、生活、文化等方面出现代际分化，乡村地缘交往开始以父辈家庭为主
乡城社交非活跃空间	乡镇，县市区	雇佣关系对乡村地缘关系的弱化	从乡到城的就业空间延展，使过去乡土的守望相助又增加了城镇的雇佣关系。在村家庭前往城内就业并适时返乡；在城家庭则在城内或城际就业通勤，居住因生计负担，考虑租赁住房	年老一辈除了农业种植，为生计在城镇从事零工等副业，反观年轻一辈就业去农化，进行上班、务工等活动，其子女也在城镇接受教育。家庭间在必要时开展一定的代际互动
乡城代际紧密空间	乡镇，县市区	血缘关系在城乡住房的实际反映	家庭核心化趋势造成家庭代际的地理分割，但血缘关系维持的代际互动又将家庭深度绑定，相比于在城租房居住，城市商品房购买带来家庭地理位置的固定性，加强了城乡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受当前结婚要求和未来子女教育需要，城市商品房购买成为代际支持主要的空间表现，以此为载体，出现了家庭隔代抚养、探望拜访等一系列行为

合当前就近就地行为趋势，打造村民行为空间与生活圈相匹配的空间体系。从乡村生活圈建构的行为逻辑来看，目前在村家庭多就近就地务工，自身获得可观收益后，往往会被其他家庭所效仿，去往相同的地点从事类似工作。同时，在城家庭受限于家庭资本，往往会选择附近城镇，避免过远的时空距离成为父辈子辈情感交流和物质支持的制约因素^[7]。依据当前村民家庭就近就地的生产生活取向，其理想的乡村生活圈空间体系应是与社会紧密性时空路径映射出的三种行为空间完全嵌套，即一村所有的家庭代际交往、城乡通勤都可以在本县市所辖的某几个距离较近的城区镇区开展（图10）。这种优势优点显而易见：一是在村父辈与在城子辈在功能上组成有效合作单元，为整个大家庭带来“终生筹划”；二是相关工作及适宜生活场所的信息可借助同乡来获得；三是吸纳当地家庭在本县市就业定居，带来区域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的全链条整合优化，支撑就近就地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现实生活中的村民家庭在就近就地的生产生活取向，因该类群体的行为普遍性，其映射的三大行为空间可视为生活圈的组成部分。但一部分家庭因劳动技能差异、附近地区就业机会有限等原因，前往本县市内与本村距离较远的城区镇区进行生产生活，或是在省外或省内其他城市等地就业定居。上述行为使乡村生活圈空间体系呈现出偏离于理想状态的现实场景（图11）。这是由于该类群体脱离普遍的就近就地行为规律，自身所在空间内的同乡数量较少，少有同乡交往乃至互助，而且处于该空间内的家庭，特别是省外或省内其他城市的子辈家庭，与在村父辈的互动频率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情感纽带断裂。为此在优化逻辑上，应力图推动家庭代际关系的就近就地空间整合，对于那些距离本村不远，村民家庭热衷在此就业定居的城区镇区，进一步提升其就业机会和配套资源，吸引村民回流，以发挥村民“抱团取暖”“同乡同业”优势，并加强本地公租房等配套资源建设，为在城家庭提供安居可能，减少因缺乏可担负起的住房资源而造成的人口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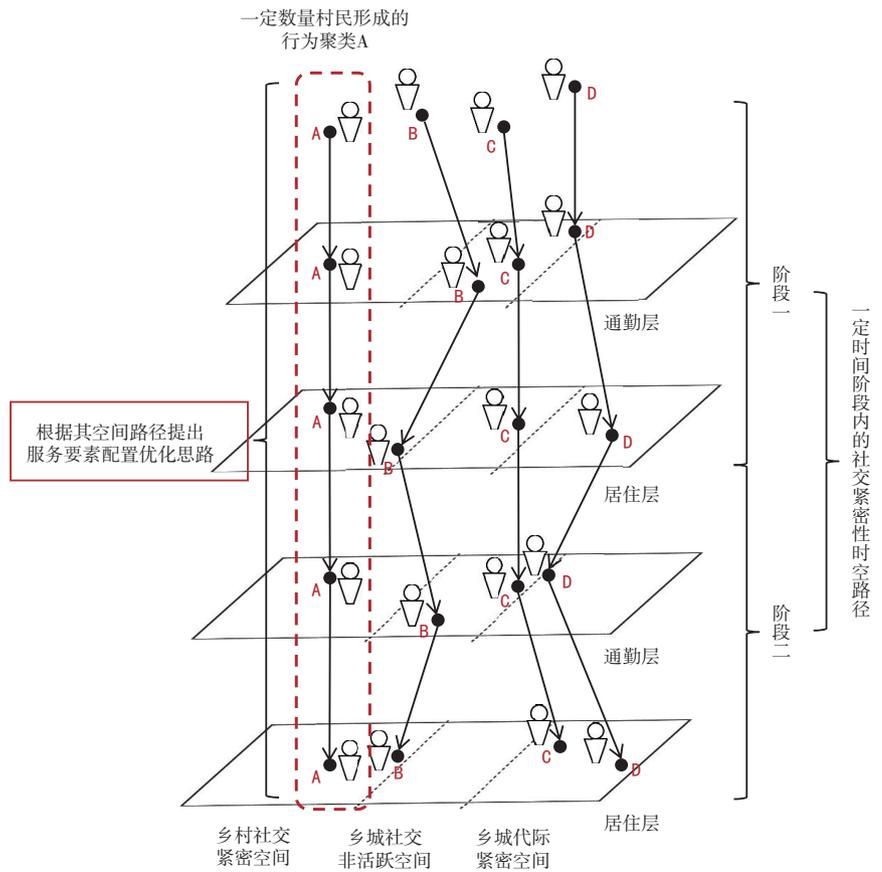


图9 基于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的服务要素配置优化思路
Fig.9 Optimization of service element configuration based on social closeness space-time p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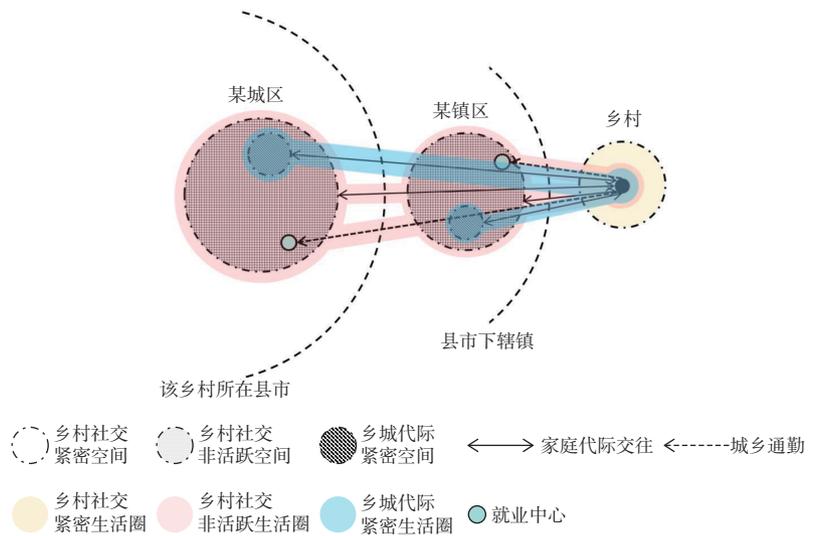


图10 理想的乡村生活圈空间体系
Fig.10 Ideal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life circle

3.3 乡内互助向城乡互助转化

随着在村在城家庭的行为分化，有必要在乡村生活圈建立城乡互助的空间干预。传统农耕社会的乡村生活圈，村民家庭依托地缘关系，通过互帮互助方

式使全村收获的作物能够维持所有村民生产生活，其时空逻辑映射在乡村地域内，则是围绕礼法建筑、居所共同构成了合理的公共服务圈层，将所有村民整合为互相帮扶的共同体。针对当前行为

组成的行为网络,牵涉着家庭资本增值和代际兴衰。任何家庭行为都需要空间支撑,考虑家庭行为对空间的影响,以及空间如何影响家庭行为的互动关系,便是我国乡村生活圈建构的应有之义。

所提出的本土化理论方法,有如下目的。关于建立社交紧密性时空路径,是在充分认识乡村家庭没有放弃农村户籍、乡村土地和宅基地等资本,以及“父辈在村、子辈在城、频繁互动”现实情形的基础上,通过在城乡广域范围内健全整个家庭运行所需的生产生活服务要素,实现城乡空间互建互构,从而避免乡村生活圈建构就乡村论乡村的局限性。关于就近就地背景下的空间体系,为顺应家庭就近就地行为意愿的自组织倾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他组织诉求,引导家庭行为在城乡空间就近就地的合理分布,提升乡村家庭生活生活质量。关于乡内互助向城乡互助转化,是针对乡村家庭服务设施供需偏离且自身无力全面解决的困境,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伴随着本土乡村生活圈建构学理逻辑的形成,未来研究工作还需要在家庭视角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城乡关系分析视野,及时开展实证分析,继续推动乡村生活圈本土化理论内容的完善。

注释

- ① 详见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 ② 详见《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5期“空间秩序转变与‘家’的扎根与脱根——一项流动摊贩进城案例的社会学研究”一文。
- ③ 2023年3月21日,笔者在S省R市D区的B村向在村175户家庭发放了合村并居意愿的调查问卷。
- ④ 对父辈、子辈、孙辈家庭划分,多依据代际结构及社会属性来进行。父辈家庭多参考以下因素,比如国家相关数据统计、子辈家庭是否分家等若干因素;子辈家庭则考虑是否能和父辈家庭进行关系匹配并脱离父辈另谋生路;孙辈则多界定为接受学校教育,即还处于子辈家庭的孙辈家庭成员,也有少量刚步入工作的人员。根据上述依据,对B村父辈、子辈、孙辈家庭进行划分,平均年龄分别为61、37、15岁。
- ⑤ 2023年3月8日,笔者在S省R市D区的

M村村民交谈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 ⑥ 据访谈了解,R市城区的企业,一般很少雇佣60岁以上男性和55岁以上女性务工,在乡村地区则是很少雇佣65岁以上男性和60岁以上女性务工。

参考文献

- [1] 李雯琪,张立,张尚武.中国城乡融合研究的议题、评述及展望[J].城市规划学刊,2022(6):36-43.
- [2] 和泉润.日本区域开发政策的变迁[J].王郁,译.国外城市规划,2004(3):5-13.
- [3] 陈青慧,徐培玮.城市生活居住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初探[J].城市规划,1987(5):52-58.
- [4] 柴彦威,李春江.城市生活圈规划:从研究到实践[J].城市规划,2019,43(5):9-16.
- [5] 邹德慈.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J].城市规划,2003(2):77-79.
- [6] 王树声.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研究[J].城市规划,2023,47(2):4-9.
- [7] 杨俊宴.凝核破界:城乡规划学科核心理论的自觉性反思[J].城市规划,2018,42(6):36-46.
- [8] 段进,姜莹,李伊格,等.空间基因的内涵与作用机制[J].城市规划,2022,46(3):7-14.
- [9] 罗震东.流乡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镇化[M].江苏: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2.
- [10] 叶红,唐双,彭月洋,等.城乡等值: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新路径[J].城市规划学刊,2021(3):44-49.
- [11] 肖作鹏,柴彦威,张艳.国内外生活圈规划研究与规划实践进展述评[J].规划师,2014,30(10):89-95.
- [12] 刘金海.农民行为研究:“关系:行为”范式的探讨及发展[J].中国农村观察,2018(5):126-142.
- [13] SCOTT J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4] 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M]//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5]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6] POPKIN S L.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17]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9] 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学术月刊,2006(7):5-13.
- [20] 刘金海.社会化小农:历史背景、演进逻辑及张力限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21] SIMMEL 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0.
- [22] BROWN A R. On social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0, 70(1):1-12.
- [23]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New York: Oup Oxford, 2007.
- [2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2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26]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 [27] 刘金海,杨晓丽.传统中国农民的观念取向:双重性及统一[J].学习与探索,2019(3):55-63.
- [28] 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生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120-126.
- [29] 陈辉.半城半乡:西部农民新生代家庭的离散性与弹性:基于关中A县B村调研[J].社会科学辑刊,2022,262(5):63-71.
- [30] 王德,蔚丹.空间行为研究的视角与技术范式[J].城市规划,2023,47(9):4-11.
- [31] HANSEN W G. How accessibility shapes land us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59, 25(2):73-76.
- [32]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70, 24:7-24.
- [33] 塔娜,柴彦威.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前沿方向[J].地理科学进展,2022,41(1):1-15.
- [34] TIAN Y, KONG X, LIU Y. Combining weighted daily life circles and land suitability for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6:1-9.
- [35] 孙德芳,沈山,武廷海.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J].规划师,2012,28(8):68-72.

- [36] 官钰,李泽新,杨琬铮.乡村生活圈范围测度方法与优化策略探索:以雅安市汉源县为例[J].规划师,2020,36(24):21-27.
- [37] 尹舒,张钟虎,张晨阳.双重生活圈背景下的近郊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研究:以重庆市板桥镇为例[J].小城镇建设,2022,40(10):60-68.
- [38] LU M, DIAB E.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x-minute city policies: a review of the North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cities' planning documents[J]. Journal of Urban Mobility, 2023, 3: 100040.
- [39] OLIVARI B, CIPRIANO P, NAPOLITANO M, et al. Are Italian cities already 15-minute? presenting the next proximity index: a novel and scalable way to measure it, based on open data[J]. Journal of Urban Mobility, 2023, 4: 100057.
- [40] 澁谷 和樹. 外出時間にみた大都市圏郊外住民の余暇活動の空間構造[J]. 地理空間, 2016, 9(2): 171-188.
- [41] 三橋 伸夫. 農村地域における生活行為依存先の変化: 新潟県小国町における生活圏の20年間の変化に関する研究その1[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 2002, 67(560): 179-184.
- [42] 三橋 伸夫. 外出行動からみた中心集落立地の変化: 新潟県小国町における生活圏の20年間の変化に関する研究その2[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 2003, 68(566): 33-38.
- [43] 森尾 淳, 杉田 浩. 中山間地域のモビリティと生活圏に関する分析[J]. 土木計画学研究・論文集, 2009, 26: 85-92.
- [44] 能美 誠. 通勤交流圏・転居交流圏設定法の開発と活動再編検討方法の提示[J]. 農村計画学会誌, 2012, 31(S): 381-386.
- [45] 能美 誠. 農村地域内の他地区訪問世帯割合と相互訪問圏に関する考察[J]. 農村計画学会誌, 2015, 34(S): 237-242.
- [46] 喻明明, 任利剑, 运迎霞. 基于时空行为的北京市周边乡村生活圈研究[J]. 南方建筑, 2022, 207(1): 26-33.
- [47] 井柳 光雄, 青木 志郎, 楠本 侑司. 農村の基礎生活圏の構造について: 農村計画の方法に関する研究そのII[J]. 日本建築学会論文報告集, 1972, 199: 57-67+103.
- [48] 藤本 信義. 農村生活圈[J]. 農業土木学会誌, 1976, 44(2): 108.
- [49] 北村 貞太郎. 新たな定住地域圏と農村計画学研究[J]. 農村計画学会誌, 1996, 15(4): 53-61.
- [50] 张季风.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日本的实践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456(12): 124-138.
- [51] 张立, 李雯琪, 白郁欣. 应对收缩的日韩乡村社会政策与经验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3): 1-9.
- [52] 罗桑扎西, 戴骊静, 杨子江. 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下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 以腾冲市新歧社区为例[J]. 规划师, 2023, 39(4): 126-132.
- [53] 杨山, 杨虹霓, 季增民, 等.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民生活圈的重组机制: 以昆山群益社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19-132.
- [54] POORTHUIS A, ZOOK M. Moving the 15-minute city beyond the urban core: the role of accessibility and public transport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23, 110: 103629.
- [55] 若菜 千穂, 広田 純一. 農山村の生活圏域に着目した生活交通サービス再構築のあり方[J]. 農村計画学会誌, 2005, 24(S): 97-102.
- [56] 若菜 千穂, 広田 純一. 農村地域におけるデマンド型交通の運行範囲の設定条件[J]. 農村計画学会誌, 2007, 26(S): 209-214.
- [57] 曾鹏, 王珊, 朱柳慧. 精明收缩导向下的乡村社区生活圈优化路径: 以河北省肃宁县为例[J]. 规划师, 2021, 37(12): 34-42.
- [58] 陈玉娟, 曹毓倩. 基于新型生活圈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研究[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2020, 48(3): 275-282.
- [59] 葛丹东, 梁浩扬, 童磊, 等. 社区化导向下衢州芳村乡村生活圈营建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1(10): 30-35.
- [60] 竹谷 修一, 上田 陽三. 北海道農村における高齢者医療・福祉施設の利用圏域に関する研究[J]. 都市計画論文集, 1993, 28: 655-660.
- [61] 西野 辰哉. 地方三都市における高齢者の生活圏域実態の横断的比較と一中学校区を目安とする日常生活圏域設定の妥当性の検討[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 2018, 83(750): 1403-1413.
- [62] 野原 康弘, 佐藤 栄治. 介護レセプトからみる介護サービス利用実態と日常生活圏域設定の課題[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 2021, 86(781): 1045-1053.
- [63] 山村 崇, 後藤 春彦. 東京大都市圏における郊外自立生活圏の住環境特性に関する研究[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 2012, 77(676): 1381-1390.
- [64] 国家统计局.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4/t20230428_1939125.html, 2023-04-28
- [65] 孙良顺, 田泽. 迈向更高水平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 基于“城乡两栖”的讨论[J]. 经济学家, 2022(6): 39-47.
- [66] 武丹, 耿虹. 场域理论视角下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辨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4): 41-49.
- [67] 本刊编辑部.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S1): 64-66.
- [68] 王向阳. 两栖式城镇化: 农民进城的一种实践性表达: 基于宁夏P县Z村的调研[J]. 宁夏社会科学, 2017(4): 122-128.
- [69] 王呈祥, 庞泽华, 刘传明, 等. 典型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驱动因素: 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10): 158-168.
- [70] 苏红键. 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 以城乡两栖促城乡融合[J]. 甘肃社会科学, 2023(4): 200-208.
- [71] 白美妃. 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 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6): 45-67.
- [72] 肖琳. 城乡两栖: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发展的策略性实践: 基于“两栖”老人现象的讨论[J]. 兰州学刊, 2022(04): 135-146.
- [73] 孙莹, 张尚武. 城乡关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变迁与发展[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 (01): 89-95.
- [74] YIN L, SHAW S L. Exploring space-time paths in physical and social closeness spaces: a space-time GIS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5, 29(5): 1-20.